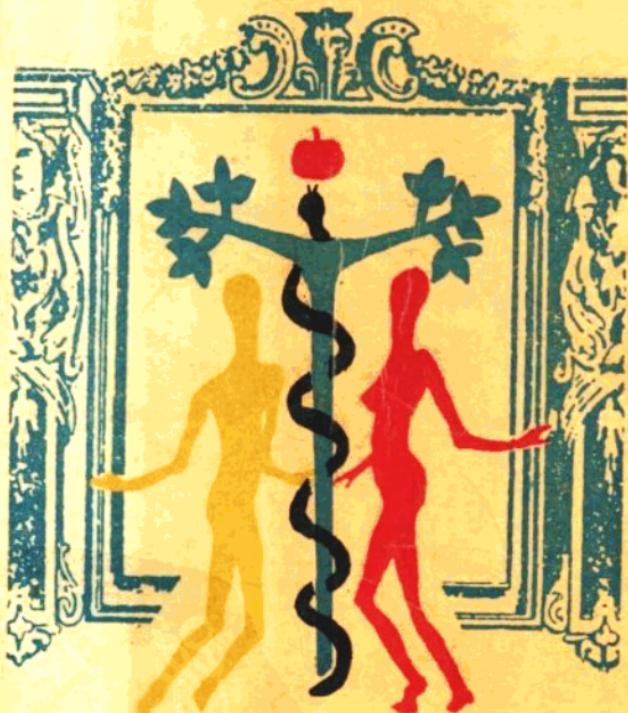


伊甸园景观

——性爱与文学创作

赵凯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共分二十三章。作者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广泛而深入地探索了人类性文化、性心理、性本能与文艺创作和欣赏中的作用与影响，对人类复杂多样的性际关系和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以及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作了缜密细致、生动有力的阐述，并提出了将文艺学与性科学相结合，组建一门新的学科——文艺性学的构想。本书面向广大读者，在写法上力争雅俗共赏，深入浅出，在进行理论探讨的同时，注意运用具体事例加以阐述。全书既有理论的深度和系统性，又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可读性强。

目 录

理 论 篇

第一章 文艺性学：艰难而诱人的新课题	(1)
第二章 性与人：马克思主义的性哲学与文 艺观	(15)
第三章 男女有别：性差制约下的创作活动	(31)
第四章 性与文艺：心理分析主义者的论域	(49)
第五章 女权主义：女性文学与批评的价值	(60)

第六章	生命源流：性际生活与文艺创作	
	(74)
第七章	永恒的动力：性在文学欣赏中的作用	
	(87)
第八章	爱情与色情：关于性爱文学的沉思	
	(101)
第九章	爱神与缪斯：作家的情爱与创作	
	(108)
第十章	社会与个体：文学作品性爱描写的三种倾向	
	(126)

作 家 篇

第十一章	嫉妒与无辜：莎士比亚笔下的丈夫与妻子	
	(137)
第十二章	美人之死：从爱伦·坡的《乌鸦》说起	
	(144)
第十三章	英国的唐·璜：拜伦的创作与爱情	
	(152)
第十四章	少女与少妇：巴尔扎克与司汤达笔下的女性	
	(159)
第十五章	原型的升华：狄更斯的生活与作品中的女性	
	(167)
第十六章	浪漫与卫道：小仲马的爱情与创作	
	(175)
第十七章	护花使者：莫泊桑笔下的“妓女现象”	
	(183)

第十八章	灵肉合一与情欲分离：劳伦斯笔下的两性世界.....	(189)
第十九章	自然之恋：泰戈尔的情爱与创作.....	(197)

作 品 篇

第二十章	《玩偶之家》：对两性关系的探索与思考.....	(208)
第二十一章	《源氏物语》：紫式部情爱的投入与呈现.....	(220)
第二十二章	国风民风：从《诗经》看民众的爱与诗.....	(229)
第二十三章	红楼极境：女性化的情爱王国.....	(240)

后 记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文艺性学..... (253)

第一章 文艺性学：艰难而诱人的新课题

同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等“姊妹”们一样，文艺性学也主要是由两种学科——文艺学与性学(Sexology)——结合而成的。它以性与文艺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主要探索人类性文化、性心理对艺术活动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摘自《文艺性学刍议》

展望人类二十世纪的学术领地，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既浩浩荡荡地汇流起来，“大文化”的宏阔视野似乎可以囊括一切；但又不断地相激相荡，分化出许多新型的边缘性学科，仿佛新生雏子，虽然一派天真幼稚，却又充盈着生机与力量。

引人注目的是，围绕着文艺这一人类精神永不凋谢的花朵，怀着各种激情的探索者们，构建了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艺美学、文艺生态学、文艺管理学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在这样的学术演进的大趋势中，我们通过对当代人文科学与文艺世界凸现出来的“性”之现象的考察，萌发了建立一门名为“文艺

性学”的新学科的构想。

如众所知，在西方的人文科学与文艺世界中，“性”的凸现已处在极为显豁的“前锋”地位：勃然而兴的性科学(Sexology)撕裂了性蒙昧、性禁锢的最后屏障；分化与延展中的弗洛伊德主义总将“性”置诸重要的地位来对待；“半边天”的女权主义执着地从女性本位出发，一边对男性文化进行批判，一边对女性文化或新的文化加以积极的构建；性解放或性革命的浪潮溢出了传统理性的堤防，几乎席卷了西方文艺的所有门类；西方的文艺批评也更专注于对文艺表现世界中的感性生命的评判，并相应地形成了以重视生命体验（特别是性爱体验）为标志的体验美学……。在这些纷繁驳杂的西方人文景观中，不难发现其所共通的一个理论兴奋点，即“性”。应该说西方人文思潮及其对文艺实践的巨大影响，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重要的、丰富的启示。当我们试图将文艺学与性科学相结合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种外来思潮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奉行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没有“拿来”的，不仅不可能有中国的新文艺，也不可能有这门“文艺性学”。

我们认为，文艺性学是由两门既有学科即文艺学与性科学交叉结合生成的边缘性学科；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性与文艺之间的复杂关系；它总属于“人学”研究的范畴，隶属于发展中的文艺理论体系，与文艺社会学、文艺心理学、文艺管理学等学科是姊妹关系，同时彼此也有一定相通的地方；就其名称而言，“文艺性学”本身清楚地表明，要全面深入地研究文艺与“性”的关系，传统的文艺学必须走向与“性科学”的结合，将性科学的研究的范畴，特别是性史、性社会学、性心理学、性文化学、性美学、性哲学等范畴与成果引入对文艺的研究之中，引入对传统文艺学的重建之中。因而“文艺性学”涉

及的研究范围颇广泛，它应包容一般所说的“性文艺研究”、“文艺中的性心理学”、“文艺中的性风俗”、“文艺与性爱意识”、“文艺与女性学”、“文艺与男性学”等等研究范畴，也包括从宏观的性文化学等角度对文艺的综合性研究和从微观的少男少女性意识等角度对相关的文艺所做的专题性研究。下面仅就几个基本方面略加阐述。

其一是性差与文艺的关系。两性与生俱来的差异及以此为基点建构起来的人的内心世界与性际关系，对文艺活动各个方面都有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艺作为表现人生、反映生活的精神产品不可能回避人本身的外在与内在的性征差异。性科学指出“性发育包括第一性征的发育、第二性征的发育和第三性征的发育。第一性征是指由遗传决定的，而在胚胎期及新生儿身上表现出来的两性生殖器官在构造上的差异；第二性征是指除了生殖器官的差别以外，两性在身体其他方面具有的性别差异征象；第三性征是指两性在行为、性格方面具有的性别差异征象，是指行为、性格方面的男性化或女性化。”^① 除此之外，作为生命有机体的人则以理性与感性的统一超拔于动物界，从而产生对自身与同类的性差意识，制约着自己在性际关系与社会生活中扮演相应的角色。而这些与文艺活动皆有或明或暗的密切关系，不仅会从创作主体身上表现出来，而且也从对象主体与接受主体身上表现出来。从性差这一基本层面上透察文艺活动，会从很多方面来恰切地解释诸如男女作家的差异及其创作个性，异性读者的欣赏趣味，人物性差制约下的言语行为的内在逻辑等等实际的问题。如从“女性学”或“女权主义”的角度来研究既往的与现实的文艺现象，就会从语言符号直至本

^① 徐纪敏主编《性科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1页。

文内在结构与意蕴发现女性独特的审美趣味，以及被男性中心社会的压抑所造成的种种扭曲变态现象，并对传统的“阳施阴受”、男主女从等观念与行为模式加以消解，为重建人类的性际关系提供科学的基础与感情的动力。

其二是性欲与文艺的关系。大量的文艺实践证明，人的性欲与美的感受、创作活动、阅读鉴赏都有着十分深切而微妙的联系。^① 许许多多的文艺家与理论家都曾或多或少地谈论过这方面的话题，只不过有的是“旗帜鲜明”、公开论道，有的则是挈友聚谈、私下论道而已。就我国多年来公开的讨论来看，相当多的人都不期而然地陷入了性欲怪圈的缠绕之中，总是执着于性欲是丑的、恶的观点，从而流于性欲描写要不要、好不好简单的道德评判中。以往流行的一个主要观点是，性欲是可以写的，但不能赤裸裸的，要含蓄、避讳、并且不能为写它而写它，要注重其“暴露”“批判”的作用。就是说，性欲描写必须寓有重要的社会内容和作者的态度倾向，“性”虽然可以成为描写对象，但决不能成为描写目的，否则就是自然主义的，有毒的，应予取缔的。虽然不能说这种观点一无是处，但却可以指出这种观点是带有机械、片面的毛病的，因为这种观点是以“性恶”为基础或前提（逻辑起点），把性现象与政治、社会学划归一路的理性思维的结果，游离了生活真实的感受，回避了文艺的突出感性的形象思维的特征，割裂了性欲与美的必然而多样的联系。一般说来，在感性范畴中，文艺与性欲的联系主要表现为“爱情描写”与“性变态描写”两大方面，这两大方面都可以通向“美”的王国。古今中外无数的爱情诗篇为男女情爱建造了无数美好的纪念碑，永久地散发着美妙难以言传的

^① 参见张敏筠编译，《性科学》，上海时代书局1950年版，第178页。

魅力。而现代性科学则指出，这种美妙难以言传的爱情就与人自身的性欲活动密切相关。即使如通常所说的“柏拉图式”的爱情也不能完全与性欲绝缘，只是受到种种限制，特别是来自“理智”的压抑而专注于精神的单一方面。应该说，性际关系的丰富多样理应包括这种“柏拉图式”的爱情，尽管真正的爱情应是两性的灵肉一体化，然而“柏拉图式”的爱情仍不乏“美”的魅力，因为它既是性欲的升华，又是生命价值的补偿。如果说注重精神恋的“柏拉图式”爱情从逃避性欲的方向上仍然进入了“美的王国”，那么，直面性欲、展示性变态的文艺创作也可以走向“美的王国”，如波特莱尔的《恶之花》中的一些诗作，川端康成的《雪国》、我国女作家王安忆的“三恋”（特别是《小城之恋》）等等。当性变态具有生命真诚的表现价值以及具有控诉性压抑的意向时，它就能够给读者带来异乎寻常的深切的感受，并且从此进入了美的范畴。象这样的严肃的描写性变态的作品是与那些蓄意海淫海盗的“色情符号”（即一般所说的“色情文艺”）有着本质的不同的，对此必须加以甄别。

其三是性文化、性哲学、性美学等各种性意识与文艺的关系。这包括对性差、性欲两个基本层面之于文艺关系的更进一步的思考。譬如从性文化学的观点看，便可将人类文化史分作女性文化与男性文化两大部分。这相对而又互补的两种文化表明着人类进化历程中男女两性命运的相消长与共命运。原始社会主要表现着元初的母性精神，母系氏族社会将此种精神衍化为崇尚平等、自由、和谐、亲情的“阴性”文化精神，并加以神圣化。后来，男性的阳刚之气冲发了出来，以力之争的刚性锋刃征服了女性，并取代了女性中心世界，建起了男性中心社会的巍峨雄伟的宝殿，等级、竞争、极权、压迫等“阳性”的文化精神得到了确立。于是，在“无毒不丈夫”的戈矛之下，女

性无可避免地在世界范围内败北了，沦为“第二性”，成了男性的附庸或奴隶。但真正的女性精神并未从这世界上隐去，一方面顽强而又自然地表现在女性的生命活动中，另一方面则被男性统治者拿去借以调节、治理社会，以“怀柔”作为“专政”暴力的补充。文学艺术对这种男性中心社会的生活真实自然是需要加以反映的，既要将男性文化精神加以弘扬（如众多文艺作品都宣扬“英雄崇拜”），又要将女性文化精神纳入男性文化的系统中来加以肯定。先秦诸子散文中的“仁者爱人”“兼爱”“小国寡民”等思想的流露，及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便是明证；而整个东方艺术的崇尚直觉和谐，崇慕天人合一的美学极境，也隐曲地通向母系氏族社会确立的“博爱”原型——以博大的母爱笼罩每一个子民，并将爱洒向每一片土地。在这里，“生命之爱”与“自然之爱”的交融，构成了体现民族集体无意识的艺术极境。伟大的《离骚》与《红楼梦》，《吉檀迦利》与《源氏物语》等东方文学的精英，都成功地表现了这种“博爱”的原型，从而在根本上弘扬了女性文化精神，及相应的女性化的审美理想，而不是男性文化的英雄主义，及相应的男性化的审美理想。尽管在现实生活中男性竭力维持其对女性的统治，女性亦被迫向男性文化认同，但在艺术中，男性则在生命无意识的驱动下，较多地向女性文化认同。这也是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与矛盾的生动反映。

对“性差”的文化学、美学的思考将有助于我们对文学艺术的深入考察。同时这也启发我们，要全面深入地探讨性与文艺的关系，必须从传统的文艺学走向与现代性科学的结合。上面我们对文艺性学研究范畴的三个基本方面予以强调，其目的则在于要证明建立文艺性学确有其必要性与可能性，而且也意在证明，性科学的研究的“性”既然不限于单纯的性欲及性行为，

那么，引入文艺研究的性科学作为一种理论参照系，其所提供的启迪也必然是丰富多样的。现代性科学告诉我们，从性生理到性心理，从性的自然史到性的文化史，从性的物理解剖到性的哲学思考，从性的变态与病变到性的常态与美好，人类研究者创设了性生理学、性发育学、性心理学、性行为学、性社会学、性伦理学、性犯罪学、性教育学、性美学、性哲学等等性科学的分支学科。这些丰富的“性知识”不仅为创作者所应具有，而且更应为研究者所具有。创作者较多的是感性的把握，研究者较多的则是理性的把握，但在对性的丰富内涵的参透上却是趋向于一致的。

由此可以说，文艺性学所观照的文艺现象决不是单一的，即不仅有所谓的性文艺、色情文艺，而且有所谓的“纯文艺”、“亚文艺”或“雅文艺”与“俗文艺”。对《金瓶梅》、《九尾龟》可以从文艺性学的角度来探讨，对《红楼梦》与各地民歌（如陕北“信天游”）也可从文艺性学的角度来考察。

总之，我们只有沿着广义的“性”与“文艺”的两相交叉的知识通道，才能建构起文艺性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并逐渐充实、丰富它，使它与一般的性科学与文艺学区别开来，从而获得自己的理论特质。

对文艺性学的探讨有许多具体的途径或方法。我们认为，选择不同的视点或研究方向来深入考察、积累思想成果，同时又不断地联系创作实践，来分析、验证已获得的文艺性学思想，这样才能尽快地促使文艺性学这门新兴学科走向完善与成熟。为此，我们在本书中所选取的主要视点或研究方向是：

视点之一，创作主体。大量的文艺实践证明，作为文艺创作主体的“性”（性别、性征与性心理、性体验等），在其感知生活、把握生活、表现生活时，均有重要的作用。即是说，从

作家创作动机的萌发到艺术个性的形成，都莫不与作家自身的“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创造了日本自己民族语言符号假名的日本古代女性（平安时期），也在民族文艺的创造中大显身手：“万叶”女性的和歌，尤其是以紫式部为代表的“平安”女性的物语，奠定了日本文艺的女性化的审美传统，高扬了东方女性与美学精髓的阴柔之美；美国精神的代表作家海明威，沐浴在开疆拓土、激烈角逐的男性文化的光照之中，以其名符其实的“硬汉文学”征服了无数的读者；中国新时期女性作家群的崛起以及女性批评家的涌现，无疑也给新时期的文坛带来了异质于男性世界的别样的景观，给溢光流彩的新文苑频添了一种诱人的魅力。在创作活动中，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们总要将自我的全副生命投入其中，这自然也要求作家将自己的性感觉、性意识和性体验化入其间，从而增强作品的真实感，同时也使作家自我的身心得到宣泄、补偿与调节。曹雪芹之于《红楼梦》、劳伦斯之于《儿子与情人》是这样，托尔斯泰之于《复活》、卢梭之于《忏悔录》、拜伦之于《唐璜》、白朗宁夫人之于她的十四行诗集也是这样。世界上那些纪念碑式的艺术之作莫不打上作家自我之性的烙印，闪耀其自我之性征的光彩。完全可以说，作家的性生理心理因素是文艺的一种温床或基因，作家生命的情欲可以升华为创造性的人间奇迹。

视点之二，对象主体。出现在作品中的人与生活中的人，应该有本质上的相同之处。那种不沾人间烟火、不谙饮食男女的英雄人物，只能以其虚假的高、大、全的方式，存在于“文革”那样荒诞的年代。无疑，阉割了人之“性”的“无性文艺”，是不会具有活力的，它们的诞生之日其实也就是它们的死亡之时。而大凡那些生命力旺盛的作品，如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

罚》等等，则无不正视人本身的“性”的存在及其作为生命驱力的价值，以生花妙笔写出因“性”而产生的爱与恨，快乐与苦痛，傲慢与偏见，宽容与嫉妒等情感境界。我国新时期文艺在打破中世纪一般的黑暗之后，创作的自由度在逐渐上升（至少在“新时期十年”中是这样），性爱描写的禁区一个接一个地被冲破。在音乐、绘画、戏曲、电影、文学等各个领域，都力求真实生动地表现人之性的生命盛观，摒弃那些虚伪造作的“性恶观”与羞耻感。特别是在文学领域，作家的笔触开始触及人物性际关系与心理世界的各个方面。张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中，侧重表现了女主人公钟雨的“精神恋”，张贤亮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则侧重描写了男主人公章永璘在畸型环境中的“生物恋”；铁凝在《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中写了少女安然的“不安然”的朦胧的性心理，刘恒则在《白涡》中以精神分析的笔法剖开了四十四岁的壮年周北路的性爱心理；古华在《贞女》中写了农村女性的性恋悲剧，王安忆在《小城之恋》中则写了城市人的性爱狂乱后的失落；莫言在《红高粱》中写了健全人对性爱权利的勇敢捍卫，史铁生在《命若琴弦》中则道出了残疾人那哀切悠长的“性自卑”心音……没有人能够否认，由于对人物之性的深刻而多样化的把握，新时期的作家们对中国新文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视点之三，接受主体。在二十世纪一些理论探索者的视界中，接受主体（受者）愈来愈受到重视，如接受美学就把受者视为艺术生命之有无、强弱的仲裁人。显然，与创作主体、对象主体一样，“性”也为接受主体所有，并在艺术鉴赏的接受过程中发挥其作用。譬如，一般说来，无论男女读者，都容易从优秀的爱情婚姻题材的作品中获得审美享受，这是因为象爱情这种艺术的永恒主题最易触动读者生命系统中的性爱神经。当

然，男女两性的审美趣味也常有所不同，勇武、激烈的情事为男性所易于接受，纤柔、雅静的情事易为女性所接受；就是同一部《红楼梦》，性别不同的读者的接受心理，常会出现不同的倾向，如男性读者多会认同于宝玉或柳湘莲，女性读者多会同情于黛玉或宝钗；有时读者出于情感共鸣的缘故，竟会不自觉地接受作品主人公的行为模式，如当年郭沫若把《少年维特之烦恼》译过来时，就颇有些少男少女因失恋而袭维特的做法走上了自杀之路。特别应予指出的是，接受主体对性文艺及涉性作品的接受情况汇成了系统反馈的信息流，分别对创作主体的再创作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发生定向性影响，因而，借鉴接受美学的思想来从事文艺性学的研究，当会开拓出崭新的研究视野。

视点之四，历史回顾。这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对自原始艺术以降的文艺作品中性因素及其表现形态的发掘、思考，一是对亘古至今的前辈关于性与文艺的思想成果的重估和借鉴。这两个方面显然皆是建构文艺性学体系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料。在文艺世界中，东西方创世的神话就鲜明地体现出了初民的性意识。由“亚当—夏娃”所昭示的男女、阴阳之道，是原始社会的一个天然而崇高的法则，禁果的偷食使人类霍然之间发现了异性之美。就象性自由和生殖崇拜在原始绘画、雕塑、舞蹈、音乐中有大量的留痕一样，关于人类性爱的文学母题也早在上古神话传说中便诞生了。日本最古老的典籍《古事记》，曾记载着日本民族诞生的神话，说是伊邪那岐命和伊邪那美命兄妹二神，绕“天之御柱”逆向而走，在相遇的地方结合，兄妹神相遇时兴奋地呼叫“哎呀！真是个好男子！”“哎呀！真是个好女子！”^① 我国古代也相传伏羲、女娲兄妹为夫妇繁衍了人类（民

^① 安万侣《古事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5页。

族)。可以说，只有先祖的异性相吸相合，才能共同擎起生命的太阳！正是异性美的发现，才形成了民族与人类社会诞生与发展的源泉。放眼看去，无论东西方任何一个历史阶段，“性”总要向文艺求偶，文艺也总要借“性”感人，即使不能明媒正娶，也要暗通款曲。正可谓是男女风情，尽托缪斯之神以传。从这里，我们将进入文艺的感性世界中，将会发现性与文艺相结合的种种奥秘与表现形式。在理论上，历史上也留下了相当丰富的遗产。在西方古希腊哲人和文艺复兴的先驱那里，在性学大师霭里斯那里，在弗洛伊德主义者那里，在杰出的女思想家、文学家波伏瓦那里，都有不少可为文艺性学所吸收的思想营养。对众多的国外人文科学方面的著作，特别是弗洛伊德主义、女权主义批评以及人类情爱史、情爱论方面的著作，都可以从文艺性学的角度进行综合的研究，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在东方，古代先贤也从各种角度对“性”加以观照，尽管这方面的论述不多，也欠系统周详，但在东方思维的直觉、顿悟中，自含有许多肯綮之见。特别是对中国、印度、日本、阿拉伯等国历史上关于性与文艺的遗产，更需加以重视，进行整理与研究。总之，只有对前人精神遗产的珍视和消纳，才会有文艺性学的巩固和充实。

视点之五，面向未来。除了面向历史，进行必要的反思之外，我们还要积极地面向未来，对人类性生活的取向及其对文艺的影响，进行一番未来学的思考。我们知道，对“性”的认识是人类自我认识的一个重要方面，性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文化学家、哲学家与文艺家、文艺理论家都在探索“性”这一斯芬克司之谜。新兴的社会生物学的创立者威尔逊曾说：“性属于人类生物学的中心问题。变幻莫测的性渗透了我们

生存的每一个方面，在生命的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形式。”^①他的努力从一个基本的层面揭示了“性”的庐山真面目，但仍然比不上文艺对“性”的“全息”性的摄照，如果文艺性学能早日成熟起来，那将标志着人类对性与文艺的更高层次的一种理性自觉。我们还知道，对人类未来性文化的天才的预设或构想，是与人类充分解放的共产主义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恩格斯曾指出：“现代的性爱同单纯的性欲、同古代的爱，是根本不同的”^②。之所以不同，就在于两性关系是建立在“相互倾慕”上的，但这点在现代尚难完全实现，还存在着不少“性异化”的现象。只有随着共产主义的到来，人们才能从根本上摆脱性爱上的种种赘加条件，达到性爱的至善至纯至美的境界，相应地，文艺对性的描写或表现才能臻至充分自由而美好的境界。西方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一书中也说：“爱欲具有的文化建设力量是非压抑性的升华”，只有使爱欲（包括性欲）从压抑中“解放”出来，促使“生物内驱力”转化成为“文化内驱力”，个体自由与人类文明、性欲满足的幸福与整个生活的幸福才能获得统一^③。著名的未来学家托夫勒也在《未来的冲击》一书中，预言了人类未来的性结合是以互爱为唯一目的的生活模式：“只有那些相爱的人，才会在一起生活。”可以想见，当“性”真正从神秘走向科学，从禁忌走向解放的这一人类生命之流，循着“自然之道”灌溉着文艺园地的时候，这里将更会呈现出一片繁花竞放的、超乎单纯的生物原则和理性原则之上的和谐景象。由此，人们对作为一门新

① 威尔逊《论人的天性》，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73页。

③ 参见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第15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